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三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 19 冊

胡居仁與陳獻章

呂 妙 芬 著

湛若水與明代心學

潘 振 泰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胡居仁與陳獻章 呂妙芬 著／湛若水與明代心學 潘振泰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98〕
序 4+ 目 2+120 面／序 2+ 目 2+110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編；第 19 冊）

ISBN：978-986-6528-89-7（精裝）

1.（明）胡居仁 2.（明）陳獻章 3.（明）湛若水
4.學術思想 5.明代哲學 6.宋明理學

126.1

98001726

ISBN - 978-986-6528-89-7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 編 第十九冊

ISBN：978-986-6528-89-7

胡居仁與陳獻章 湛若水與明代心學

作 者 呂妙芬／潘振泰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9 年 3 月

定 價 三編 28 冊（精裝）新台幣 4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胡居仁與陳獻章

呂妙芬 著

作者簡介

呂妙芬，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碩士，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歷史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從事明清學術文化史研究，主要著作有《陽明學士人社群》，其他學術論文散見國內外期刊。目前正從事《孝經》與明清政治、文化相關議題研究。

提 要

胡居仁、陳獻章是明初二位著名儒者，二人均曾師事吳與弼，後來也都奉祀孔廟。整個明代僅有四人獲此殊榮，由此可見二人的重要地位。學術史一般均以胡居仁為篤守程朱矩矱的明初醇儒，以陳獻章為開啟明代心學的先驅人物，而胡居仁也強烈批評陳獻章之學為禪。本書主要探討胡居仁、陳獻章二人的學問內涵，並且試圖將二人之學放在從朱子理學到陽明心學的發展史中觀照。全書主要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旨在說明朱子學從南宋到明初的變化，已顯出愈來愈重視實踐篤行與強調心體的趨向，此正是胡、陳二人思想產生的大時代背景。

第二部分詳細討論並比較胡、陳二人思想內容的異同。

第三部分則進一步將胡、陳二人思想特質與朱熹、王陽明交互比較，試圖進一步說明胡、陳二人的思想在學術發展史上的意義。



目

次

序 論	1
第一章 南宋至明初的理學發展	5
第一節 南宋末年至元代	6
第二節 明代初期	24
第二章 胡居仁與陳獻章思想研究	35
第一節 胡居仁對陳獻章的批評	36
第二節 由胡居仁的批評反觀其思想	40
第三節 陳獻章自得之學	52
第四節 是禪非禪的議題	62
第五節 同門相契	70
第三章 胡居仁、陳獻章在理學發展史中的定位	75
第一節 朱子與王陽明的思想型態	75
第二節 胡居仁與朱子之學	89
第三節 白沙學與朱子學、陽明學的比較	96
第四節 「心」在理學中的演變	101
第四章 小 結	105
附錄：胡居仁與陳獻章年表	109
參考書目	115
後 記	119

序 論

我選擇研究胡居仁（1434～1484，敬齋）、陳獻章（1428～1500，白沙）二人思想，是基於對以下兩個問題的關切：胡居仁和陳獻章個人學問內涵的異同，以及二人在明代學術發展史中的定位。從個人學問內涵的觀點看，胡居仁和陳獻章同處於明初儒學界，共同師事吳與弼（1391～1469，康齋），也同樣效法吳與弼「絕意科舉、慨然作聖」的精神。黃宗羲說：「（敬齋）以有主言靜中之涵養，尤為學者津梁。然斯也，即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宜同門冥契」；〔註1〕侯外廬也說：「餘干學派，在吳與弼理學中是『得其篤志力行』的……是指在吳與弼的靜觀、靜中涵養的方法，刻苦奮勵，篤志不改。至其大端，與陳獻章並無實質的區別」。〔註2〕均以胡居仁、陳獻章二人學問中隱然存在著一種同門相契的學風精神。但我們若轉看胡、陳二人的文字風格與生活方式，立刻可察覺到他們完全不同的生命情調。胡居仁的《居業錄》是屬於語類體析理式的問答；陳獻章的文集則充滿詩歌體情境式的抒發。胡居仁「左繩右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雖器物之微，區別精審，沒齒不亂」，〔註3〕是近乎宗教儀式般莊嚴謹敬的生活；而陳獻章「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註4〕則是寄情天地山水的逍遙自在。另外，對於主講於象徵程朱理學精神的白鹿洞書院，胡居仁的殷殷厚望與陳獻章的慨然拒絕，亦透露

〔註1〕黃宗羲，《明儒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卷二，頁30。

〔註2〕侯外廬編，《宋明理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下卷，頁145。

〔註3〕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二，頁29。

〔註4〕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五，頁80。

著二人對傳統儒學見解之差異。而胡居仁對陳獻章學問的極力批評，指斥為禪學，不僅源於二人性情與風格的迥異，更因二人的學問具有某些根本性的差異。因此，胡居仁和陳獻章學問中的同與異，實是一耐人尋味的問題，這也就是本書並提二人思想所欲探究的課題。

再者，從學術發展史的角度看，明代初期是由程朱理學到陽明心學發展中的一個關鍵時期，此時學術界已瀰漫著注重心體、講求身體力行的學風，〔註5〕此學術氛圍是陽明心學發生的重要背景。而胡居仁、陳獻章二人，正是這個關鍵時期中最具名望與影響力的大儒，此從整個明朝僅有四人獲得陪祀孔廟的殊榮，而胡、陳二人均在列的事實，即可見一斑。因此，不僅胡、陳二人的思想值得深入研究，對他們思想的了解，亦能深化我們對理學發展史的認知。

一般思想史都以胡居仁為朱學之秀，以陳獻章為王學先驅。我們從《胡文敬集》也看見胡居仁屢屢致書當時的學者，如羅倫（1438～1480）、張恕（d. 1508）、張元禎（d. 1506）等，極力辯論陳獻章學問之非，欲維護聖學門第。〔註6〕由此我們或可說，在胡居仁與陳獻章身上，我們正可窺見理學、心學易位前某種對峙的情形。然而，心學之發展並非獨立於朱學之外；相反的，朱學內部為此發展提供了相當的根據。〔註7〕而且胡居仁的學說也顯明了反求於內、身體踐履的心學色彩。故胡居仁、陳獻章之學除了具有某種對立性外，從整體學術演變的角度來看，二人又有著呼應承轉的關係。透過對此二人思想的研究來觀照學術史的發展，並探討二人的學術定位，即是本書的另一重要課題。

上述兩個課題——一個人的思想內涵、大時代學風與長期的學術發展——其實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性。一個人的思想內容主要是針對其生存時代所進行的思索與回應，雖然個人獨特的創造力，常常是促使人類文明變動的重要力量，也是創造歷史的主因，然而時代和社會所形成的複雜機制，卻具有主導和限制個人創造的力量。因而，要研究一個人的思想內涵，不可能只注重其思想的表達而忽略其所生存的社會及所處的學術環境；然而，我們對一個

〔註5〕 見第一章第二節。

〔註6〕 胡居仁在〈與羅一峰〉、〈奉張廷祥〉、〈奉憲副張希仁〉等書均提及陳獻章學問太虛妙，有違正學，望學者留意。胡居仁，《胡文敬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一，頁30b～33b，33b～34a，34b～35a。

〔註7〕 見下文。

時代的瞭解，卻也仰賴我們對當時個別思想家有更正確的認識。在此個人、時代與學術史三者互動交織的關係中，我們對任何一方面的瞭解正依賴於對其他方面的瞭解，不斷更新的知識也催促著我們不斷修正從前的認知。限於個人之學力，本書對於明代政治、經濟、社會的研討有明顯的疏忽，所討論的重點仍主要集中在胡居仁和陳獻章的思想內容，以及理學的傳承與發展。第一章「南宋至明初的理學發展」，主要概述從朱子理學到明初的學術發展與學風轉變，希望藉此提供對胡居仁、陳獻章二人所處的時代一大體的觀照，作為進一步討論二人思想的學術史背景。此章並不想突顯胡居仁和陳獻章的個別性，而是透過長期學術史的視角，來觀看傳統對二人在這段學術發展史中的定位，這也是本文的出發點。第二章「胡居仁與陳獻章思想研究」，主要由二人的文字風格、思想內涵、生命情調去探討二人學問的異同。第三章，再度回到「從理學到心學」長期學術史的觀照，則是將胡居仁、陳獻章，與理學和心學代表人物朱熹（1130～1200）、王陽明（1472～1528）進行比較，希望透過對四位學者思想的比較，能進一步突顯胡、陳二人的學術特質，及其在學術史上的重要意義。此章在深入討論胡、陳二人思想之後，再探學術定位的問題，是嘗試對傳統學術史觀點進行反思，希望提出比第一章的概述更深刻的理解。

第一章 南宋至明初的理學發展

南宋朱熹和陸九淵（1139～1192）的學說，一般均被視為理學和心學的代表，甚至被賦予某種學派對峙的意味，但這兩派學說在當時及後代所擁有的影響力並不相當。〔註1〕朱子生前，學說雖曾遭朝廷所禁，〔註2〕但朱子死後不久，偽禁解除，不僅其學說能繼續流傳，更因著朝廷科舉的倚重而形成學術獨霸的局面；陸學卻不同，陸九淵死後，即消沉不顯。思想史要歷經三百年後，到明代中葉王陽明興起，才再一次把心學帶到高峰，也再次使陸九淵的著作與聲名獲得彰顯。〔註3〕然而這段從理學到心學的發展歷程，並不是由陸九淵學說的復活而引起，而是根源於朱子學內部的發展而來。我當然不是要完全排除陸學對後學的啟發與影響，只是學術的變化更多反應著當代的問題，也更多是與主流（思潮）對話的結果。在南宋以降一片朱子學風之中，理學本身隨著時代、人物而有各種轉變，南宋曾被貶黜的朱子學，在元、明已成了士子們攀登仕途的踏石階，成聖之學成了利祿之學的規定範本。朱子學不但是每一位士子的必讀教材，它也因著舉業所伴隨的利祿觀念，成為許多學者所批判的對象。然而無論信奉或批判，朱子學都深切地主導著明代士子們的學習內容。即使明初逐漸蘊釀著一股強調身體力行的心學風氣，這也

〔註1〕 見下一節。

〔註2〕 參見馮琦原編，陳邦瞻纂輯，《宋史記事本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6），卷八〇，頁678～685。

〔註3〕 王陽明提倡陸象山之學，並在正德十六年刻《象山文集》，令撫州府金谿縣官吏遍訪陸象山子孫，免其差役，並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這對陸學之再顯有重要影響。見《王陽明年譜》，收於《王陽明全書》（臺北：臺北正中書局，1979），第四冊，頁125。

是在朱子學範圍內發展、蛻變的產物。

本章將簡要說明從南宋到明初學術發展的歷史。第一節討論南宋到元代的理學傳承及重要的學風表現；第二節討論元代到明初的學風特色，及其做為心學發展關鍵期的要素。希望透過對這長期學術發展的簡要勾勒，能夠提供我們一個比較整體性的觀照點，也讓我們對胡居仁、陳獻章二人所處的時代學風，以及傳統對其學術的定位，有更寬廣的認識。

第一節 南宋末年至元代

南宋朱熹集宋代理學之大成，〔註4〕同時期的陸九淵在學說上與朱子有相當的距離，在當時學界也具有重要影響，後人更以理學、心學加以區分二人的學問特色。然而，這兩個具有某種對立意義的學派在南宋到明初的三百年間，並沒有構成均勢的局面。陸九淵早年在家鄉金谿（江西）槐堂書院授徒，晚年在貴溪（浙東）應天山立象山精舍講學，弟子大體分佈在江西、浙東兩地。陸九淵去世後，陸學中心從江西移到浙東，家鄉的勢力快速消沉，成為朱學的天下。故黃宗羲曰：「其學脈流傳，偏在浙東」；〔註5〕全祖望（1705～1755）：「象山之門，必以甬上四先生為首」。〔註6〕甬上四先生指楊簡（1141～1225）、袁燮（1144～1224）、舒璘（1136～1199）、沈煥（1139～1191）。南宋時期的陸學，尚有楊簡可與朱學相抗衡，到了元代，陸學只有陳苑、趙偕等人努力持守師說，〔註7〕然已無法抗拒整體社會從下到上的一片朱子學風。

與陸學的快速消沉相反，朱子學派卻在南宋末年快速竄升，終於席捲整個學術界，成為獨霸學術的局面。其間的因素自然很多，但以朱子寓自己思想於大量的書籍註釋之成就，眾多弟子在士大夫社群中所發揮的力量，以及朝廷制度性的提倡，應是最重要的原因。〔註8〕由於朱子學在這時期的廣大影

〔註4〕陳榮捷在〈朱熹集新儒學之大成〉一文，就朱熹於新儒學之發展與完成、道統之建立，及《四書》之形成三方面，討論朱子集宋代儒學之大成。見陳榮捷，《朱學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82），頁1～35。

〔註5〕黃宗羲撰，全祖望補，《宋元學案》（臺北：中華書局，1984），卷七七，頁2。

〔註6〕黃宗羲撰，全祖望補，《宋元學案》，卷七四，頁1。

〔註7〕全祖望：「徑畝歿而陸學衰，石塘胡氏雖由朱而入陸，未能振也。中興之者，江西有靜明（陳苑），浙東有寶峰（趙偕）。」見黃宗羲撰，全祖望補，《宋元學案》，卷九三，頁1a。

〔註8〕據陳榮捷所記，朱子門徒分佈於福建，浙江、江西、湖南、安徽、江蘇、四

響力，強烈主宰著學術的發展與風氣之遞嬗，故下文將先討論南宋到元代的朱子學傳承。

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鄭丙（1121～1194）上疏請禁道學，曰：「近世士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註 9〕淳熙十五年（1188），兵部侍郎林栗（1142 進士）與朱子論《易》、《西銘》不合，遂劾朱曰：「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註 10〕紹熙五年（1194）七月，宋寧宗即位，雖曾召朱子爲侍講，〔註 11〕但當時韓侂胄（1152～1207）擅權，朱子上疏忤侂胄，遂遭「褫職罷祠」，並更改「道學」爲「僞學」，此即是所謂的道學之禁。朱門在遭僞禁之初，也大受打擊，黃榦（1152～1221）曰：

向來同學之士，今凋零殆盡。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大約不過此數人而已。〔註 12〕

朱子歿後，學禁漸弛。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追贈朱子信國公，朱子地位得到恢復。〔註 13〕元代以降，朱子學更成爲科舉考試的標準，統御讀書人的思想。〔註 14〕因此，從元、明以降，朱子學一直佔有穩固的地位，而其

川、湖北、廣東、河南、山西，幾乎來自全國，人數眾多。見陳榮捷，〈朱門之特色及其意義〉，《朱學論集》，頁 281。朱子學從南宋末年始逐漸爲朝廷所用，成爲官方意識形態的主要思想內容。見 Liu, James T.C., "How Did a Neo-Confucian School Become the State Orthodox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3.4 (1973): 483～505; Hoyt Cleveland Tillman, *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2), pp.231～263.

〔註 9〕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八〇，頁 679。

〔註 10〕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八〇，頁 680。

〔註 11〕 參見王懋竑，《朱子年譜》（臺北：世界書局出版，1984），卷四上，頁 194～212。

〔註 12〕 黃榦，〈復李貫之兵部書〉，氏著，《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北京：線裝書局，2004），卷十四，頁 7a。

〔註 13〕 嵇璜，《續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48，頁 1b；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41，頁 789。

〔註 14〕 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詔定科舉、定條例，第一場爲明經經疑二問，自《四書》出題，用《朱子章句》。考經義，《詩》以朱注爲主，《尚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見《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八一，

間學術的主要傳承則如黃百家（1643～1709）所言：

黃勉齋榦得朱子之正統，其門人一傳于金華何北基，以遞傳于王魯齋柏，金仁山履祥，許白雲謙。又于江右傳饒雙峰，其後遂有吳草廬澄，上接朱子之經學，可謂盛矣。〔註15〕

即以黃榦為中心，下分兩派：（1）金華一派傳何基（1188～1269）、王柏（1197～1274）、金履祥（1232～1303）、入元則為許謙（1270～1337），史稱為金華四先生。此派金履祥弟子柳貫（1270～1342），又傳明初大儒宋濂（1310～1381）。〔註16〕（2）江西一派傳饒魯（生年待查 1193？～1264），饒魯傳程若庸，再傳則為元代吳澄（1249～1333）。〔註17〕

此外，朱子門人陳淳（1159～1223），一生未仕，於朱子思想有所推展；朱子再傳弟子黃震（1213～1280）、真德秀（1178～1235），以及與真德秀齊名的私淑門人魏了翁（1178～1237），均是南宋重要的理學家，也是傳承朱子學的重要學者。〔註18〕因南宋偏安江南，上述學者主要在南方；到了元代，北方也逐漸受到朱子學的影響，據黃百家言：

自石晉燕雲十六州之割，北方之為異域也久矣。雖有宋諸儒疊出，聲教不通。自趙江漢（復）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樞、竇默、許衡、劉因之徒，得聞程朱之學以廣其傳，由是北方之學鬱起。〔註19〕

又《元史》曰：

自趙復至中原，北學者始讀朱子之書。許衡、蕭𪔐講學為大師，皆誦法朱子者也。金履祥私淑于朱子之門，許謙又受業于履祥。朱子之學，得履祥與謙而益尊。迨南北混一，衡為國子祭酒。謙雖屢聘不起，為朝廷所禮敬。承學之士，聞而興起，《四書章句》、《集註》及《近思錄》、《小學》通行于海內矣。延祐開科，遂以朱子為取士之規程。終元之世，莫之改易焉。〔註20〕

隨著趙復被擄至北方，程朱理學開始在北方流傳。元代統一南北後，當

頁 2018～2019。

〔註15〕黃宗羲撰，全祖望補，《宋元學案》，卷八三，頁1b。

〔註16〕黃宗羲撰，全祖望補，《宋元學案》，卷八二〈表〉，頁5a。

〔註17〕黃宗羲撰，全祖望補，《宋元學案》，卷八三〈表〉，頁1a～b。

〔註18〕侯外廬編，《宋明理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上卷，第十六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

〔註19〕黃宗羲撰，全祖望補，《宋元學案》，卷九〇，頁1b。

〔註20〕柯紹忞，《新元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51），卷二三四，頁1a。

時身為國子祭酒的許衡（1209～1281）在朝廷中大力推展朱子學說，則是元代儒學的重要領袖，也進一步奠定程朱學做為官學的地位。以上簡述南宋到元代重要的理學傳承，底下將介紹這些重要理學家的思想重點，以突顯這段時期的學術風尚。

一、南宋理學家

黃榦（1152～1221，字直卿，勉齋先生）是朱子門下第一高足，朱子以女妻之。全祖望引袁桷（1266～1327）云：「朱子門人當寶慶、紹定間，不敢以師之所傳為別錄，以黃公勉齋在也」。^{〔註21〕}黃震更以他為繼朱子、張栻（1133～1180）、呂祖謙（1137～1181）三先生後的第一人：「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晦庵先生得年最高，講學最久，尤為集大成。晦庵既沒，門人……獨勉齋先生強毅自立，足任負荷」。^{〔註22〕}可見他在朱門中的影響力。

黃榦雖沒有哲學專書，然因其為朱子學派的中心人物，學說也以發揮朱子中心思想為主，故影響後代甚鉅。陳榮捷說，黃榦對太極觀念的探討、對道統的闡揚，都直接影響了後代學者。^{〔註23〕}雖然黃榦在〈中庸總論〉、〈中庸總說〉中，也論及道之體用的問題，但他的為學宗旨應是〈聖賢道統傳授總敘說〉中所記：

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

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註24〕}

可見黃榦主要承朱子「居敬窮理」內外兼修的為學進路，且重視在身心上用功。陳榮捷指出，居敬窮理之言在黃榦的文章中出現得很頻繁，而且黃榦對於道德修養比哲學探求更有興趣：「榦於上達之學如理、氣、或窮理等，幾未予闡說，榦謂『古人為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功』。此在黃榦亦即『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慾而已』」。^{〔註25〕}

陳淳（1159～1223，字安卿，學者稱北溪先生）曾兩次到朱熹門下求教，第一次在朱熹守漳州時（1190～1191），朱熹教以「上達」之理；十年後第二

〔註21〕黃宗義撰，全祖望補，《宋元學案》，卷六三，頁12b。

〔註22〕黃宗義撰，全祖望補，《宋元學案》，卷六三，頁11b～12a。

〔註23〕陳榮捷論到黃榦對朱子道統觀及太極的重視，對後代學者有很大的影響。陳榮捷，〈元代之朱子學〉，《朱學論集》，頁299～329。

〔註24〕黃宗義撰，全祖望補，《宋元學案》，卷六三，頁3a。

〔註25〕陳榮捷，〈元代之朱子學〉，《朱學論集》，頁328；頁309。

次求見，當時朱熹已寢疾，教以「下學」之功。〔註 26〕朱熹死後，他避居南陂，從事講學。面對當時的朱陸之爭，他不僅積極批評陸學，也致力於發揚朱子思想，對朱子學的流傳貢獻很大。全祖望對他學術地位有如下的評述：

滄洲諸子，以北溪陳文安公爲晚出，其衡師門甚力，多所發明，然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註 27〕

陳淳的思想主要建立在解釋、發揮朱子思想上，《嚴陵講義》、《四書性理字義》是其代表作。在《嚴陵講義》中，陳淳討論了天理、道統、致知力行等問題；在《性理字義》，他則疏釋《四書》中的哲學用語，發揚朱子思想，也表達自己的見解。蒙培元指出，陳淳以「天命」爲一切的最終根源，自天命而下，講太極、理、道、性，而歸結於心，並以「致知力行」爲重點。〔註 28〕關於「心」，陳淳說：

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于吾心是理之中也哉？〔註 29〕

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真能盡得心。〔註 30〕

心雖不過方寸大，然萬化皆從此出，正是源頭處。〔註 31〕

以心體爲天理之所在，萬事萬化之源頭，而天下萬物無一之非我心，學問道德之成，即在窮此心之量。這種說法相當突顯「心體」的重要性，看似與陸

〔註 26〕《宋元學案》：「及文公守漳，請教文公，曰：凡聞義理必窮其原。先生聞而爲學益力，日求所未至，文公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後十年，復往見文公，陳其所得，時文公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見《宋元學案》，卷六八，頁 1a。

〔註 27〕黃宗義撰，全祖望補，《宋元學案》，卷六八，頁 1a。

〔註 28〕蒙培元《理學的演變：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頁 92～110。

〔註 29〕陳淳，《心體用說》，《北溪大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十一，頁 3a～b。

〔註 30〕陳淳，《北溪字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上，頁 19b。

〔註 31〕陳淳，《北溪字義》，卷上，頁 19a。

九淵的心學思想接近，但是在修養論上，陳淳很重視氣質之蔽，也講求主敬致知之功。他說：

人惟拘于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又重以耳鼻口四肢之欲爲之累。於是此心始梏於形氣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身矣。人之欲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註32〕

雖然心體是根源，但只有透過致知主敬的工夫，此心體才可能正確發用，这正是他持守朱子學說、批評陸學的關鍵處。〔註33〕他不僅強調致知主敬，更重視知與行的交互發用：

（致知力行）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實相關係，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註34〕

此處發揮朱子「知行並進」之說，而不以「知」先於「行」，雖不是如王陽明「知行合一」在理論上提出嶄新見解，仍可見其欲將行與致知工夫更緊密結合的意思。他又說：

大抵聖學以力行爲主，而致知以副之。以力行爲主，則日日皆是行底事；以致知爲副，日間講究皆所以達其行，徹首尾無容絲髮間。

〔註35〕

由此可見，陳淳的學問以力行爲主，「知」是要知「所以行」，即是爲「行」而知。

眞德秀（1178～1235，字景元，後更名景希（一說希元），學者稱西山先生）受學於朱熹弟子詹體仁（1143～1206），是南宋末年聲望很高的理學家。《宋史》稱：「自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

〔註32〕陳淳，《北溪大文集》，卷十一，頁1b～2a。

〔註33〕陳淳：「求道過高者，宗師佛學，陵蔑經典，以爲明心見性不必讀書，而蕩學者于空無之境」；「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聖門工夫自有次序，非如釋氏妄以一超直入之說，欺愚惑眾。預從下學，方可上達，格物致知，然後動容周旋無阻。陸學厭繁就簡，忽下趨高，陰竊釋氏之旨，陽託聖人之傳，最是大病。」見黃宗羲撰，全祖望補，《宋元學案》，卷六八，頁3b；8a。

〔註34〕陳淳，《用功節目》，《北溪大全集》，卷十五，頁5a。

〔註35〕陳淳，《與陳伯梁論李公晦往復書》，《北溪大全集》，卷二八，頁8b。